



博士文丛·经管系列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 叶庆祥 著

跨国公司本地嵌入 —— 理论、实证与政策选择

M

NC's Local Embeddedness:

Theory, Practice, and Policy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博士文丛·经管系列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 叶庆祥 著

跨国公司本地嵌入

—— 理论、实证与政策选择

M

NC's Local Embeddedness:

Theory, Practice, and Policy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跨国公司本地嵌入: 理论、实证与政策选择 / 叶庆祥
著.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8. 4
ISBN 978-7-308-05864-3

I. 跨… II. 叶… III. 跨国公司—企业管理—研究
IV. F27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40055 号

跨国公司本地嵌入

——理论、实证与政策选择

叶庆祥 著

责任编辑 杜玲玲

封面设计 刘依群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28)

(E-mail: zupress@mail. hz. zj. cn)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http://www.press.zju.edu.cn>)

电话: 0571—88925592, 88273066 (传真)

经 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

排 版 浙江大学出版社电脑排版中心

印 刷 杭州杭新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17

字 数 317 千

版 印 次 2008 年 5 月第 1 版 200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05864-3

定 价 34.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部邮购电话 (0571)88072522



叶庆祥，男，1977年生，广东省东莞市人。先后于2001年、2004年和2006年在浙江大学获得管理学学士、经济学硕士和管理学博士学位。在国内多种重点核心期刊发表学术论文20多篇，其中多篇被人大复印资料转载。参与多项国家、省部级课题研究。2006年12月后就职于东莞市委政策研究室，当前主要研究领域为企业战略管理、产业经济和公共政策研究。

摘要

跨国公司的本地嵌入问题一直是后进国家和地区十分关心的问题。它很大程度上成为后进国家和地区能否成功利用外资发展本地经济、落实追赶战略的关键。韩国、台湾等地区就是非常成功的例子。但与美好愿望相反的是,一些国家和地区经常出现外资的“松脚性”现象。所谓“松脚性”,描述的是跨国公司虽然投资当地,但它们往往只与海外发生联系,而与本地的产业联系很少。在这种情况下,跨国公司不仅给本地产业的溢出带动效应有限,而且在外部环境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很有可能会搬迁到其他更低成本的地方。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就是“拉美化现象”。尽管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工业化初期,以墨西哥为典型的部分拉美国家成功引进大量外资,发展外源型经济。但与台湾和韩国不同的是,由于跨国公司并没有嵌入于墨西哥当地的产业网络,而是长时间停留在“两头在外”的加工贸易形态,一直没有成功发展出本地产业。恰逢 20 世纪 70 年代的全球不景气,外资大量撤离,墨西哥等国家最终陷入了产业空洞化、经济倒退的困境。由此可见,如何将跨国公司“引进来”固然重要,但如何将跨国公司“留下来”、“促发展”更为关键。跨国公司本地嵌入正是相对跨国公司的“松脚性”问题而言,研究的是跨国公司的“根留本地”问题。

经过近三十年来的改革开放,我国已经成为了经济发展最快、引进外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之一。外资对于我国的经济腾飞发挥了功不可没的作用。但与此同时,跨国公司在我国不少地区同样不同程度上存在“松脚性”现象。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和经济区域化日益加深的今天,来自周边国家和国内地区间的竞争越来越激烈,资本的区域流动性更强,已经出现一些外资企业转移到其他地区和国家的现象。另一方面,当前我国正全面实施自主创新的国家发展战略,此战略的成功离不开作为我国主要经济主体的跨国公司的参与。在上述背景下,研究跨国公司的本地嵌入问题对我国更是具有重大的时代意义。

尽管许多国家和地方政府已经开始意识到跨国公司的“松脚性”问题,但是已有的外资政策仍把重点放在如何把外资“引进来”,而在如何促进跨国公司本地根植发展方面,仍存在诸多政策盲点和难点,很大程度上仍停留在零星措施层面。上述实践困境,一方面反映了跨国公司本地嵌入问题的现实复杂性,另一方

面是由于缺乏理论上的系统指导。诚然,国际经济理论、跨国公司理论、产业集群理论、全球价值链理论等都从不同理论视角对跨国公司本地嵌入问题有所涉及和探讨,也从不同侧面提供了一定解释力,但是一直缺乏系统性研究。

各国的实践表明,跨国公司一般不会主动嵌入本地。出于种种原因,一些跨国公司有意选择与本地产业网络保持距离。在此过程中跨国公司和地方发展往往会出现各种目标冲突问题,可见,本地嵌入就很可能成为地方政府一厢情愿的事情。当然,当地政府也并非完全无能为力,因为本地嵌入并不完全是跨国公司自主选择行为的结果,它会受到投资地各种社会制度文化因素的影响与制约。因此,仅仅从跨国公司单一主体角度来考虑其本地嵌入行为是不够的。事实上,跨国公司的本地嵌入往往是多方主体(如跨国公司母公司、子公司、地方政府和地方企业)互动博弈的结果。而且,在不同阶段,跨国公司本地嵌入的主要影响主体和主要影响因素会发生变化。要解开本地嵌入的目标冲突问题,寻求可能的解决办法,一个可行路径就是把本地嵌入置于多主体、多尺度和动态过程中去求解。这也恰恰弥补了现有理论视角的不足:跨国公司理论基本上是从跨国公司个体角度来考虑,产业集群理论则是着眼于地方角度,国际经济理论和全球价值链理论则关注于全球化角度而对地方的角色处理不足。

本书采用实践问题导向的逻辑路线,在借鉴和整合现有各种理论视角的基础上,提出了跨国公司本地嵌入的整体性分析框架。笔者认为,跨国公司本地嵌入的实质是在本地嵌入过程中跨国公司和地方发展面临的各种目标冲突问题得到有效调节的过程,是跨国公司内部力量、本地化力量和全球化力量的合力结果。具体表现为跨国公司母公司、子公司、地方政府与地方企业所形成的三股博弈力量的作用过程,即母子公司关系互动,全球价值链上下环节企业间的权力关系,以及本地区位力量与跨国公司的博弈关系的交替主导,这三者的交替主导组合及其变化推动了跨国公司本地嵌入的演进和消退。

本书着眼于从动态过程中去破解跨国公司本地嵌入的各种困境,寻求可能的政策出路。处于不同本地嵌入阶段,会面临不同的主要影响因素、主要影响主体和主导力量,因而也会在内外在机理和政策焦点等方面表现出不同的阶段性特征。根据阶段性特征的不同,本书将跨国公司本地嵌入过程划分为两个阶段:演进阶段和消退阶段。事实上,这两个阶段正好对应了现实中的两大政策实践困境:一是如何推动跨国公司本地嵌入从而促进当地经济产业升级发展;二是如何避免嵌入本地的跨国公司因外移而导致本地产业空洞化风险。在本书的分析框架下,不仅两个阶段的行为机制得到了很好的统一解释,而且也为两大政策实践困境的解决提供了重要思路。

为了更系统地理解跨国公司的本地嵌入行为,为我国政策实践提供更现实

的指导借鉴,本研究还做了三方面的工作:一是“定位”。任何问题都有它的来龙去脉,任何事物都应该有其所属类别,这是人类认识世界事物的需要。现有的关于跨国公司本地嵌入问题的研究往往分散于不同领域的研究文献中,一直难以找到自身的体系脉络。因此,有必要系统理清跨国公司本地嵌入的研究范畴和脉络,给理解跨国公司本地嵌入提供一个方位。二是“定量”。一个问题停留在概念层面无助于实际问题的评价与解决,因此开发一套针对跨国公司本地嵌入的衡量体系或评价指标显然是一项不可或缺的基础性工作。三是“本土化”。无论是作为一项规范的学术研究,还是服务于研究成果的本地应用,结合我国实际情况的“实证”检验工作都是非常必要的。如果说“定位”和“定量”二者是研究跨国公司本地嵌入问题的前提工作,那么“本土化”则是研究成果的本地化应用与修正。

下述五个方面组成了本书的核心内容,也共同构成了跨国公司本地嵌入的整体性研究。

1. 定位问题(第二章)。跨国公司本地嵌入属于跨国公司与地方关系的研究范畴。跨国公司与地方关系是一个重要、新兴的研究领域,但相关文献显示这方面的研究一直处于零散的状态。本书对跨国公司与地方关系的研究脉络、当前研究现状以及未来研究展望进行了系统的研究,试图为该领域研究勾勒一个较为完整的脉络图景。跨国公司与地方关系的相关研究脉络,主要呈现出两条主线:一条主线是“地方”内涵的发展,从传统理论对空间地理的忽略,到后来受关注,再到最近在产业集群相关研究中的兴起;另一条主线则是全球与地方的关系演变,从两元对立处理到统合处理,从抽象的全球与地方关系具体到企业与地方关系。当前,针对“跨国公司与地方关系”的主流研究,大致上可划分为三类研究视角:第一类着重从地方的角度去看全球化的作用与地方的优势;第二类则是从全球化的经济体系去审视的地方的角色;第三类是从跨国公司经营管理角度去审视跨国公司与地方的相互关系。上述各种相关理论脉络给跨国公司本地嵌入描绘了一幅广阔的图景和坐标。从中得出的一个重要启示是:跨国公司的本地嵌入行为同时受到来自于跨国公司内部网络、外部全球价值链和本地经济社会制度环境的多重张力的综合影响,因此必须放在一个更广的视野来考察。

2. 定量问题(第三章)。本书以本地嵌入的构成要素为切入点,构建了跨国公司的本地嵌入的衡量体系。该衡量体系包括实体要素和效应要素两个层面。其中,实体要素层面包括四个指标:地理嵌入、关系嵌入、结构嵌入和成员嵌入。关系嵌入衡量的是本地嵌入关系的强度,结构嵌入衡量的是本地嵌入关系的网络结构,地理嵌入主要是从嵌入关系的地理空间分布角度提出,而成员嵌入则是从本地网络的开放性角度提出。四个指标综合反映了跨国公司本地嵌入在实体

要素层面上的表象。效应要素包括两个指标:社会资本和网络权力。社会资本着重体现了本地嵌入内涵的“社会性”,网络权力着重体现了“互动性”,两者所具有的地方特性则共同体现了“地理性”,两者所内含的学习性机制则共同体现了“学习性”。两个指标很好地综合反映了全球化背景下跨国公司与地方的关系本质。

3. 演进机制问题(第四章)。本地嵌入是多方主体互动博弈的结果。本地嵌入的动态演进过程综合表现为“四个博弈主体”(跨国公司母公司、子公司、本地企业和当地政府)在三方面情境因素(跨国公司内部因素、本地区位环境和全球价值链特征)影响下的互动作用,形成“四大演进动力”和“三大演进模式”。“四大演进动力”指跨国公司的整体战略部署、子公司的自主行为、地方政府的推动、本地企业的成长。“三大演进模式”则指跨国公司与地方政府博弈下的本地嵌入演进模式、母子公司互动下的本地嵌入演进模式、全球价值链下的本地嵌入演进模式。在本地嵌入整个过程中,上述各种演进动力和演进模式并非是独立并行的;相反,在本地嵌入过程的不同阶段,四大演进动力各自的作用力是交替和变化的,三大演进模式也呈现出交替主导的组合关系。

4. 消退机制问题(第五章)。本地嵌入失效可以理解为多方主体互动博弈的无效解。跨国公司本地嵌入失效呈现出过程阶段性特征,主要表现为本地不结网、网络封闭、网络学习效应差三种类型。在我国,跨国公司本地嵌入的失效原因主要表现为五种:第一,中介机构建设落后和社会关系非本地化的双重困境;第二,全球价值链的不平衡治理关系;第三,内外资企业商业规范与惯例的差异;第四,制度厚实的缺失;第五,内外资企业隔离的制度障碍。本地嵌入的“消退”表现为网络外移现象。与跨国公司本地嵌入演进机理相比,跨国公司网络外移表现出不同的决策机理。第一,决策思考基点的不同:从“长期合作”规划转变到“短期生存”考虑。第二,演进动力的变化:演进阶段表现为母公司、子公司、地方政府与本地企业的交替组合与主导;而消退阶段则主要表现为母公司与本地企业的互动博弈。第三,社会资本和网络权力的角色变化:在无外移压力情况下,社会资本起着先导性作用,网络权力起着强化性作用;在有外移压力情况下,网络权力起着决定性作用,而社会资本起着缓冲性作用。网络外移模式可以概括为六种:追逐网络、延伸网络、重建网络、垂直整合、在地升级和保持不变。社会资本与网络权力在不同的情境因素(一是新投资地产业环境,二是网络成员目标一致性)下,影响了跨国公司网络外移决策模式选择。不同的网络外移模式会对地方产业网络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

5. 本土化问题(第六章)。基于统计分析的研究结果表明:杭州和东莞两地跨国公司本地嵌入的整体程度有限,尤其在实体要素层面。无论是本地嵌入指

标还是本地嵌入的影响因素指标,大部分杭州都显著高于东莞,投资杭州的跨国公司倾向于选择“重建网络”的模式。有关本地嵌入内在路径和外在影响因素的理论假设都基本得到了显著性验证。内在路径假设的统计结果,表明了跨国公司本地嵌入行为的非自动性。从影响因素的统计结果来看,实体要素的影响因素中,主导的是跨国公司内部因素,本地区位因素次要,全球价值链因素没有影响;效应要素的影响因素中,本地区位因素主导,跨国公司内部因素次要,全球价值链因素没有影响。上述实证研究结论不仅为相关利益主体提供了重要的政策建议和决策依据,而且回应和推进了当前跨国公司理论、全球价值链理论和产业集群理论等视角和观点。

目 录

第一章 导 论	1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1
一、现实背景	1
二、理论背景	4
第二节 几个主要概念界定	7
一、嵌入与本地嵌入	7
二、关系与网络	15
第三节 研究目标与研究方法	20
一、研究目标	20
二、研究方法	20
第四节 研究技术路线和内容安排	25
一、技术路线	25
二、研究思路与章节安排	26
第二章 文献综述	27
第一节 地方角色的演变	27
一、传统理论对空间的忽略	27
二、对地理空间的再发现	29
三、关于全球化与本地化的争论	30
第二节 “全球本地化观”下的两个研究视角	32
一、本地—全球视角	32
二、全球—本地视角	36
第三节 跨国公司理论的发展	39
一、网络观	40
二、连接观	43
三、本地嵌入观的提出	45

第四节 跨国公司—地方关系的经验研究现状	45
一、不同视角下的跨国公司与地方的关系	45
二、跨国公司的本地嵌入	51
第五节 本章小结和讨论	53
第三章 本地嵌入的概念内涵与内在路径	55
第一节 本地嵌入的理论内涵	55
一、“企业—地方”关系	55
二、本地嵌入的概念框架	58
三、本地嵌入的内涵特征	60
第二节 本地嵌入的实体要素	63
一、关系纽带的作用	63
二、实体要素的类型	63
第三节 本地嵌入实体要素的分析维度	65
一、网络分析模型的评论	65
二、关系嵌入与结构嵌入	67
三、本地嵌入的地理空间性：地理嵌入的提出	69
四、跨国公司与本地企业的本地嵌入比较：成员嵌入的提出	71
第四节 本地嵌入的效应要素	73
一、本地嵌入效应中的“推—拉”模式	75
二、社会资本的推动效应	77
三、网络权力的拉动效应	82
第五节 本章小结	87
第四章 跨国公司本地嵌入演进机制	89
第一节 本地嵌入的形成与发展：一个整合分析框架	89
第二节 本地嵌入的影响因素	91
一、本地区位因素的影响分析	91
二、跨国公司内部因素的影响分析	97
三、全球价值链因素的影响分析	103
第三节 跨国公司本地嵌入的发展演进	108
一、跨国公司与地方政府博弈下的本地嵌入演进	109
二、母子公司互动下的本地嵌入演进	112
三、全球价值链下的本地嵌入演进	120

四、跨国公司本地嵌入的内在路径过程	123
五、跨国公司本地嵌入演进的过程机制:以上海大众为例	125
第四节 本章小结及讨论	133
一、研究结论	133
二、进一步讨论	134
 第五章 跨国公司本地嵌入失效及网络外移机制	137
第一节 跨国公司本地嵌入的失效	137
一、跨国公司本地嵌入失效的表现	137
二、跨国公司本地嵌入失效的原因	140
第二节 跨国公司生产网络外移决策机理	147
一、跨国公司网络外移的表现	147
二、跨国公司网络外移的原因	148
三、跨国公司网络外移的决策思考模式	151
四、网络外移对地方产业网络的影响效应	156
第三节 本章小结及讨论	159
一、研究结论	159
二、进一步讨论	160
 第六章 跨国公司本地嵌入的内在路径与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基于浙江杭州与广东东莞的分析	163
第一节 研究背景	163
第二节 研究假设	165
一、本地嵌入的内在路径假设	165
二、本地嵌入的影响因素假设	166
第三节 研究方法	169
一、变量选择与测量	169
二、数据来源与说明	175
三、数据分析方法	175
四、研究变量的效度与信度	175
第四节 数据分析	176
一、总体描述性统计	176
二、杭州与东莞的比较分析	190

三、本地嵌入内在路径的统计结果分析	195
四、本地嵌入影响因素的统计结果分析	199
第五节 本章小结与讨论	212
一、研究结论	212
二、进一步讨论	217
第七章 结论与展望	223
第一节 主要结论	223
第二节 主要创新点	227
第三节 研究意义	227
一、理论意义	227
二、实践意义	228
第四节 研究展望	231
附 录	
附录 1:附表	233
附录 2:调查问卷	234
参考文献	238
后 记	258

第一章 导 论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一、现实背景

当前,外商直接投资(FDI)对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东道国(地方)政府希望通过吸引外资,一者弥补本地发展资金的不足;再者,更为重要的,借机学习国外先进技术知识和管理经验,以此带动本地经济产业发展。因此,许多发展中国家纷纷采取招商引资策略,发展本国经济(如当初亚洲“四小龙”中的中国台湾和新加坡就是成功例子),甚至一些发达国家地区也希望通过吸引外资来重振当地产业(如 20 世纪 80 年代末到 90 年代,英国原已衰落的汽车产业通过吸引日本汽车跨国公司投资本地获得了复苏)。

然而,在一个资本能够进行自由地有效流动的时代,任何一个地区都无法保证投资本地的外资不会再次外移出去。一些发展中国家在实施利用外资发展民族经济的发展战略下,成功引进了大量外资,但是发现“筑巢引凤”所形成的一些外向型加工区域仅仅是外资企业暂时落脚的“飞地”。在不少开发区往往看到一些独立的大型外资企业的“堡垒式”建筑,它们往往只与海外母公司发生联系,而与本地企业联系很少,甚至是“两头(采购与市场)在外”,如珠三角出现的“三来一补”工厂。这种现象不仅存在于工厂型企业,即使一些研发中心,也可能很少与当地其他机构发生联系。这些跨国公司往往可能随着本地成本优势的下降而再次发生外移。事实上,国内已经开始出现了少数跨国公司的外移行为。这表现为部分跨国公司开始向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国家或地区转移,且通常这种跨国公司的外移行为或多或少地会给原投资地带来一些负面影响(项后军,2003),比如劳动就业的减少,地方财政收入的下降,甚至是当地经济产业的衰退。这些现象常常被称为跨国公司的“松脚性(footloose)”,描述的是跨国公司与当地联系少,易外移,溢出效应有限等问题。由此,我们不禁产生疑问,跨国公司的迁移是否不可避免,是否有可能让它们根留于本地?

尽管许多地方政府已经开始意识到跨国公司的“松脚性”问题,但是已有的外资政策往往仍把重点放在如何把外资“引进来”,而如何促进跨国公司本地发展在政策实践上仍停留在零星措施层面。比如,在当前的一些招商引资策略上,东道国地方政府极力吸引大型跨国企业,如全球五百强;再如,东道国通过促进跨国公司人员、采购、研发等的本地化来留住跨国公司。当前国内就出现一些大中城市地方政府纷纷争先吸引跨国公司在本地设立研发中心。但现实是,规模大并不一定能降低跨国公司外移的可能性。另外,从知识传递与学习的角度来看,跨国公司的本地化对于促进本地发展固然重要,因为这增强了跨国公司的“溢出源”。跨国公司在本地的功能活动范围越广,技术知识层次越高,本地的溢出效应的可能性越大,但这只停留于可能性。更直接的是跨国公司的溢出渠道的建立。因此,仅仅着眼于引进大规模的、实力强的跨国企业,推动其“本地化”仍是不够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施“市场换技术”的外资战略,在一些行业领域不十分成功。究其原因,跨国公司没有把前沿技术转移到我国固然是主因,但即使把前沿技术转移过来,也大多锁在跨国公司在当地的子公司中,对于本地企业产生的溢出效应很弱。简言之,仅仅把跨国公司引进来还是不够的。为了促进跨国公司的溢出效应,发展本地产业,一些国家和地区政府采取旨在促进跨国公司与本地企业之间的合作关联的政策措施,包括原产地规则和当地含量条款等。但在实践中又发现,这种要求并不一定能有效地推动当地供应商的成长,因为当地子公司可以以内部化或从位于当地的其他跨国公司子公司或从母国带来供应商等方法“达标”。对于东道国来说,更为重要的是如何促进跨国公司建立本地产业关系,如何促进其技术溢出和转移,从而更好地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这显然更具有战略性意义。针对跨国公司的“松脚性”,最近国内外一些学者(王缉慈,2004)提出将目标集中于如何改进本地引资制度以便能更好地为外商服务上,其目的多在于培育本地与外企之间的信任、默契以及社会资本等以便“粘住”外资企业。还有学者(郑胜利,黄茂兴,2002)建议采取集群战略(cluster strategy),即在产业集群的基础上促进跨国公司和本地企业的互动。

由此可见,跨国公司的“本地嵌入(local embeddedness)”问题很大程度上成为后进国家和地区能否成功利用外资发展本地经济、落实追赶战略的关键。所谓本地嵌入,是相对跨国公司的“松脚性”问题而言的。简单地说,就是借用来自社会学的“嵌入”概念和理论来解释 FDI 中跨国公司与投资地的关系。“嵌入”的最原始和基本的含义是认为“经济行为会受到社会关系与社会结构的影响”(Granovetter,1985)。从这一点出发,跨国公司的本地嵌入问题关注的不是 FDI 的区位选择问题,而是跨国公司投资后与地方间发生的经济社会互动及其效应问题;同样,本地嵌入问题关注的重点不是跨国公司个体的本地化问题,而是跨

国公司如何在当地建立各种经济社会联系,并且融入本地的经济社会网络,从而对当地经济发展产生影响的相关问题。

诚然,过去许多学者为促进跨国公司本地嵌入问题而提出的引资政策、本土化政策等都具有一定合理性。并且,“集群式”的引资战略也是一个理想化的发展模式。但是,这些政策的背后往往没有考虑到区域内的“主角”——跨国公司又是以何种角度来面对自己的生存之道。跨国公司是否在当地生根发展不是当地政府单方面考虑的事情,离开从本地嵌入主角——跨国公司的角度来考虑,不管政府作出多具前瞻性的产业发展政策,都不免失之偏颇,理论与实际永远是平行的两条线。

现实中,跨国公司本地嵌入行为具有两个重要特征。

一是非自动性。事实上,本地嵌入并非是所有跨国公司的自动性(*automatic*)行为。很多时候,跨国公司的动机与地方的发展诉求是不一致的。例如,从地方角度来说,如果跨国公司产业网络中纳入更多本地企业,这显然更有助于地方经济发展,但对跨国公司来说,这样做却不一定对自己的经营绩效有正面影响。比如对于仅仅为了利用当地廉价劳动力和低廉土地水电的跨国公司来说,本地嵌入未必是最优选择。再如,关于跨国公司本地溢出效应的相关研究结论显示,劳动力在跨国公司与本地企业之间流动有助于促进溢出效应,对于当地产业发展具有积极意义。但是如果员工过多流失,跨国公司需要花费更多精力和成本进行员工培养,这样不利于子公司自身能力的成长与提升,反而影响到跨国公司的本地嵌入性。由此可见,在本地嵌入问题上,跨国公司和地方发展的目标可能是冲突的。

二是非自主性。同样,本地嵌入也并非完全是跨国公司的自主性(*self-determinant*)行为。当今一部分热衷于全球化的学者认为,传统的“地方空间”已经被一个全新的“流的空间”所取代,跨国公司可以定位在任意地点,如果某个地点不可行,也能轻易外移到别处(Castells, 1989, 1996)。言下之意,FDI完全是跨国公司自主性选择行为的结果。持类似观点的还有过于强调了跨国公司个体选择行为而忽视地方反作用的传统跨国公司理论(如折中理论)。事实上,跨国公司的投资行为和形态一定程度上会受到当地政府和制度的影响与制约(如本章一开始提到的当地政府的各种直接和间接的产业政策)。无论是发达国家(如日本),还是新兴国家或地区(如中国台湾和韩国),以及发展中国家(如中国和印度),在招商引资过程中,政府对于跨国公司的行为都起着重要的引导作用,尽管不同国家之间存在差异,而且在不同时期角色也有所变化。因此,仅仅从跨国公司的角度来理解其本地嵌入行为是不够的,跨国公司本地嵌入往往是多方主体(如跨国公司母公司、子公司、地方政府与地方企业)互动博弈的结果。

综上所述,无论是仅从地方角度,还是仅从跨国公司角度,都难以认识跨国公司本地嵌入的全貌。只有同时从跨国公司和地方发展双方角度来着眼,才可能找到更好的行为路径。事实上,将本地嵌入视为多方主体互动博弈结果,恰恰从微观层面上给跨国公司和地方发展之间的目标冲突提供了可能的有效“均衡解”。那么,本地嵌入的研究焦点,既不是跨国公司个体,也不是地方,而是彼此的连接关系(linkages/bonds)。这些连接关系的形态与特性,刻画了跨国公司与地方的关系的本质内涵,也成为研究跨国公司与地方关系的微观基点。

二、理论背景

上述现实背景以及问题逻辑视角反映出了当前理论研究的不足,同时也引发了本书研究的问题。

跨国公司本地嵌入的“非自动性”和“非自主性”决定了本地嵌入问题的复杂性和多方主体性,进一步决定了需要从动态过程性与系统性视角中去寻找“目标冲突”的可能解决办法。

(一)本地嵌入的复杂性反映出“本地嵌入”概念与表征的单一性,即缺乏系统的概念分析框架

跨国公司本地嵌入属于“企业—地方关系”范畴的问题。传统经济与管理理论(如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李嘉图的相对优势理论和俄林的要素禀赋理论,以及早期韦伯的区位理论、贸易分工理论和单一区位的管理理论等)和跨国公司理论(如海默的垄断优势理论、弗农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巴克利的内部化理论和邓宁的折中理论等)视野中,“空间”或“地方”概念往往被简单处理,甚至被忽略。后来以克鲁格曼等学者为代表的新贸易理论力图将地理学的基本概念带入经济学领域。他们使用规模经济、外部经济、不完全竞争、空间集聚等因素来解释国家与区域经济发展的竞争优势。但是他们沿用的仍然是主流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仅用经济因素解释空间经济(陆大道,2005),而国家或区域之间在制度、社会结构和文化方面的差异往往被忽视,这些因素对创新、投资和经济增长的影响常常被当作微不足道。同样,在传统的跨国公司理论中,“空间区位”也被视为静态的空间承载体(杨友仁和夏铸九,2005)。传统跨国公司理论中更为强调跨国公司的动机与行为,而较少关注跨国公司与地方的相互关系。上述理论中,跨国公司与地方的关系基本没有得到处理。

最近,以产业集群理论为代表的各种相关地方发展理论对于地方和空间地理的角色给予了高度重视。更为重要的是,它强调基于地理接近的各种经济社会连接关系在产业集群竞争力和地方发展中的核心作用。“连接关系”成为研究“企业与地方关系”的微观基础。其中,既强调了经济性因素,也强调了社会制度